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許崇清文集

许锡挥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图书馆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许锡挥 编

許崇清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崇清文集/许锡挥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10

ISBN 7 - 306 - 02354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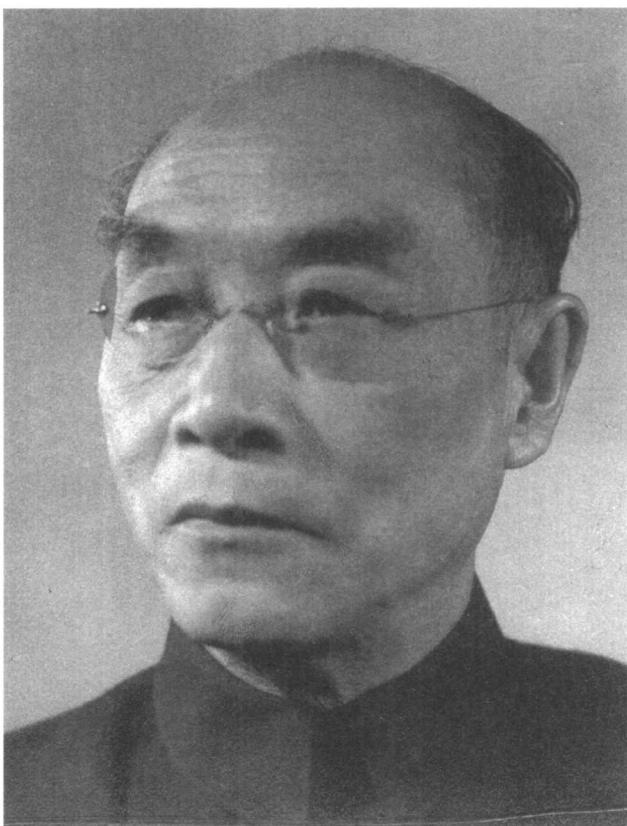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I . 许 II . 许… III . 许崇清—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809 号

责任 编辑	欧燕华
装 帧 设 计	方楚娟
责 任 校 对	飞 燕
责 任 技 编	黄少伟
出 版 发 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020)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020)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印 刷 者	广东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经 销 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	635mm × 960mm 1/16 23.25 印张 29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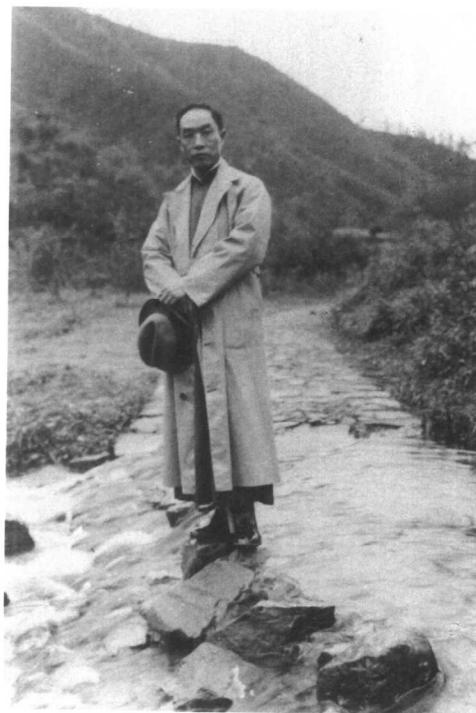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许崇清
(一八八八年至一九六九年)



在日本留学时的
许崇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期的许崇清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崇清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讲授“教育哲学”，在文学院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这是一九四七年他和家人与毕业生在广州寓所前合影



一九五五年，许崇清校长（前左）和副校长冯乃超（前右）、教务长黄焕秋（后左）、校办主任连珍（后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期的许崇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许崇清夫妇和鲁迅夫人许广平（中）在一起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总序

黄达人

在中山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出版了。将我校已故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结集出版，这是我们对先贤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中山大学八十年的光荣历史，是广大师生追求真理与光明，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是历代学人引进、创新、传播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历史；是杰出学人辈出、人才培养繁盛、教学科研精进日新的历史。在中山大学的发展史上，镶嵌着一代又一代著名学人的名字，陈寅恪等一批人文大师以他们在文、史、哲等各领域的宏大建树，奠定了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也奠定了中山大学作为中国名校的地位。

在为学上，他们不计名利得失，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不遗余力地吸收新知识、新观点，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为人上，他们不侮食于自矜，不曲学以阿世，忠于良知，敢于坚持。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的闪光。

他们的精神随着他们的著作在世间不息地流传，随着时间的流逝，披沙见金，更见珍贵。

文库中所收的著作，在学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时间已经证明，它们是薪火承传的中国文化的座座丰碑。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更是后学者得窥学术门径、走上学术道路的指南之针。

在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著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

同时又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共性，就是它们无不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人生永不放弃的勇气。

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为中山大学营造了良好的学风，丰富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术传统，积聚成我们这所大学珍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这些后学者以无尽的精神力量。

因陈寅恪先生的文集早前已出版多种，尊重陈先生女公子的意见，本文库没有编入陈寅恪文集。但我校蔡鸿生教授新近出版了《仰望陈寅恪》一书以及中山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陈寅恪诗词笺证》一书，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中山大学的理科和医科同样是大师云集、群星灿烂，理科和医科的杰出学者文库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版。

我深信，这次出版的“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必可嘉惠学林，裨益后世。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于康乐园

前　　言

许崇清作为教育学家和教育哲学家，也是教育实践家，他的一生中，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是难以分开的。他在青年时代就以建立一个教育学的新体系作为理想，日后的实践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理论往往未能付诸实践，因而感到无奈。

他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靠自己个人的摸索，找到辩证唯物论的。他的最高学术成就是阐明了教育的本质，解决了教育哲学中众说纷纭的问题，发展了这门科学。

任何人的学术思想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许崇清的学术生涯超过半个世纪，而且正值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他的学术思想总会刻上时代的印记，反映当时朝代更迭和思潮翻腾的现实。我们了解其学术理论时，应当持历史的观点，把握其科学的精神。

广东教育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曾出版了一部五十万余字的《许崇清文集》，由雷洁琼、黄焕秋两位前辈作序，那是按学科门类分篇的。现在这本文集选辑其中有代表性的，按写作年月顺序编排，时间跨度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样，也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轨迹。

许崇清的一生与中山大学有不解之缘。正如一九五一年他第三次出任校长时冯乃超副校长所说：“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在八十周年校庆之际，编辑出版这本文集，是很有意义的。许崇清在当年曾满怀深情地对欢迎他的师生说，历经战乱和磨难的中山大学，今日有如春回大地，“我们从此努力耕耘，今后丰收是可以预期的”。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五十多年，他离开人世也三十多年了。我们不应忘记他为中山大学曾经做过的贡献。

许锡挥
二〇〇四年八月

许崇清传略

许崇清，字志澄，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八）出生，其父炳𬀩时任山东候补知府，帮办治理黄河，当年黄河水清，属于罕见，所以取名“清”。

出身于广州高第街（原番禺属）一个著名封建大家庭的许崇清，幼年丧父，家境逐渐破落，其母靠缝补为生，抚养七个子女。十二岁时他被送往湖北武昌寄居在姑母家，并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

湖北武昌是许崇清接受新思想启蒙的地方。因他就读的学校距两湖书院不远，便有机会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先辈结交，从而也受到了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一九〇五年许崇清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在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他剪下头上的辫子丢进太平洋，以表示与旧思想决裂。当时他仅十七岁。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停止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先在南京，后来又到了福建。这时他已是同盟会员。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许崇清又重去日本继续求学。在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一九一八年大学毕业后进研究院研究学习。留学期间，他专攻哲学和教育学，对日、德、美等国的教育学说尤为注意，并在指导教师的影响下，遍历了新康德哲学、孔德社会学以至赫尔巴特教育学等领域。一九一九年起，他开始以建立一个教育学的新体系作为自己的理想，通过自己的摸索，走上了辩证唯物论的道路。

在留学时期，他发表的文章侧重于概念的分析。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发表的《国民教育析义》中，研究了国民教育的概念，从制度上、内容上进行分析，并介绍了当时著称于世的普

鲁士国民学校各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在《哲学新义》（一九一七年）中，他论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指出古希腊以两者为同义，笛卡儿和黑格尔则把科学列为哲学的一部分，到康德为了阐明形而上学，便把哲学作为科学的概括，作为科学的全体。他认为，各门科学以其对象与方法不同相区别，哲学作为科学之学而统其成，它应包括科学全体。

许崇清还针对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的演说展开了两次学术争论，分析了宗教和信仰的关系。他在《再批判蔡子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文中，最早向我国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〇年，许崇清学成回国。八月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并告知孙中山：“蔡元培先生要我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孙中山对他说：“你离开祖国多年了，初回来一切情况都不了解，我看你不必急于去北京，先在上海住下来看看，也是有好处的。”后来，他回广东省亲，朱执信、廖仲恺要他留下参加革命工作，而且孙中山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他便留在广州。不久，就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开始了终生的教育工作。

二十年代上半期，许崇清参加了当时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活动。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全省教育委员会，是由陈独秀和他具体负责的。一九二二年，廖仲恺赴日本与苏俄代表会谈，他随同前往，而且这次秘密会谈正是以他和廖仲恺的侄女廖六薇（又名承麓）的婚礼为掩护的，他也为会谈做了一些工作。一九二三年，孙中山邀他加入国民党并参加该党改组工作，他表示同意，随即由廖仲恺介绍入党，并被指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教育”部分的起草工作。他无心从政，仍以教育为业。

在回国以后的数年间，他发表的文章较多。在《今后思想家当取的针路》（一九二〇年）中，提出要学习现代科学的精神，认为我国的旧学是臆测、传说或常识性而无科学的确实性，希望今后思想家注意科学的方法和体系。在《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一九二〇年）中，详论了英、法、美、

德、日等国学院和大学发展的沿革，并比较了各国的学位制，还就欧美大学的异同以及综合大学与独立学院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他对我国大学的建设以及中等教育的配合，提出了建议。他主张大学应担负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综合大学与独立学院的办理应有区别，理科与工、农、医等科应密切联系。《论第五届教育联合会改革师范教育诸案》（一九二〇年）一文，表达了他对改革我国中等师范和高等师范的意见，建议中师不分甲乙两级学校，高师实行四年制，三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一年授以职业训练。在《学校之社会化与社会之道德化》（一九二〇年）中，他反对那种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道德观念的观点，提出有机体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要求学校社会化和社会环境道德化。在《产业革命与新教育》（一九二一年）中，指出欧美是社会先进化而后改革教育以适应社会，中国社会不发达，应改造教育以助成社会的演化。在《教师与社会》（一九二一年）中，他指出，教师必须有高远的见识，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教师应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教育史，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认为教育理论应与实际结合，学校应与社会联系。在《新教育思潮批判》（一九二五年）中，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一种以为教育超脱政治才能办好的思潮，指出教育断不能与社会政治相脱离。他在文中对世界教育思潮各流派的分析，眉目清新。

一九二五年，他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教育方针草案》，指出中国过去从来不重视科学技术教育，主张模仿欧美、日本以及苏俄的产业教育，配合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实施普遍的科学技术教育。他认为，应从初中开始，课程依地方生产事业需要逐步分化，半工半读，使人人成为具有实用常识兼备科学知识的生产者。为了贯彻这一主张，提出了十四点具体纲领。一九二六年，他发表的《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是一篇重要论文，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任务，论述了教育革命的问题，强调教育对于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作用。这一年，他还全文翻译出版了 Scott Nearing 著的《苏俄之教育》一书，对于向我国教育界介绍苏俄新教育制度的情况有很大作用。

一九二七年以后，许崇清致力于教育理论的研究，希望能实现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新体系的愿望。在《农村学校改造的五个要则》（一九三〇年）中，他提出通过改造农村学校，以促进农村经济变革和农村生活道德化的问题。在《教育哲学是什么？》中，他论述了哲学和教育的关系，认为哲学可以说是教育的一般原理，教育可以说是哲学的具体实行，所谓教育不外是一个具体的哲学。指出了教育的目的应求诸社会而不是求诸个人，教育决不是发展个人潜伏的一切性质和能力而是选择那些特定的性质和能力，以促进它们的发展。他深入浅出地把哲学的起源以及哲学与教育的关系作了分析，并从教育的本质与教育的目的性来说明教育与社会不可分离的特性。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许崇清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年四十三岁。他上任后在该校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并将理学院改为理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和化学工程两系，还开始兴建新的农学院校舍。一九三四年，广东统治者陈济棠为了鼓吹封建道德，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许崇清以他在教育界的威望，挺身而出反对读经，被撤了当时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在华南引起巨大反响。

一九三四年冬，许离开广东到杭州闲居，在这里写了《姜琦著〈教育哲学〉正谬》和《〈姜琦著《教育哲学》正谬〉答辩底再正谬》两篇学术论文，从培根、洛克分析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又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析到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对教育理论意义重大。他反对把教育作为一种技术，也反对把教育与生产力和经济生活等概念混淆，指出生产力是教育的成果之一，而不是教育本身。

抗日战争爆发，广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山大学曾迁校到云南澄江。一九四〇年四月，许崇清又出任该校代理校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大学于七月迁回广东北部山区乐昌县的坪石镇。这次迁校得到了许多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支持，人们希望以中山大学为支柱的广东文化教育阵地，能与桂林相呼应，推动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山大学迁回广东之后，物质条件很差，校舍非常简陋，师生员工的工作和生活都十分艰苦。

许崇清倡导学术自由，聘请了一批进步学者到校任教或讲学，如王亚南、李达、王造时、洪深等。他们宣传抗战，抨击时弊，呼吁民主，使学校的空气为之一新。王亚南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李达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崇清也在研究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这对于中山大学的进步文化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一系列措施，深得广大师生的支持和拥护，却得罪了国民党 C.C. 派。特务分子密告他“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一九四一年七月，许崇清被免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职务。当时，进步师生掀起了“挽许”运动，在全校贴标语、出墙报，并游行示威。

许崇清被免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的职务之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这是一个空衔，他同时兼任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是，他便利用这个编辑出版机构，继续从事进步文化教育工作。当时，在这个机构里有大批共产党员，许崇清掩护他们并依靠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出版了《新建设》、《教育新时代》等刊物以及其他书报，有力地宣传了全民抗战，宣传了民主思想，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华南的进步文化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书报被当时中山大学钟敬文教授称为“浓黑中的几盏灯火”。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许崇清在学术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所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中国文化与科学建设的方向，第二是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在《“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一九三九年）一文中，批判当时文化建设问题上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离开中国历史遗产照搬外国一套，另一种是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论点，认为应当批判地吸收外国的成果。在《民族自由与文化建设》（一九四〇年）中，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中华民族要在恢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在全人类已造就的文化总和中去吸取和发展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这是新旧结合的一条大道。总之，许崇清是明确反对那种强调民族传统而排斥外国文化的观点的。在《中国当前的科学思想》（一九四一年）中，他考察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状况，指出中国过

去科学不发达，哲学的发展亦自有限。他认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分不开，中国工业落后，提倡科学思想，免不了像浮萍一样。他满怀希望地展视中国文化科学的明天：“金黄时代不在我们背后，是在我们前面。”《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真的无法开展科学运动么？》是一篇论战性文章，他从哲学和自然科学关系的角度，批评了那种夸大唯物辩证法的作用的反科学观点，并根据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指出，自然科学的本性与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先于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正是把握自然科学的总体而形成的。他认为，把唯物辩证法“奉为绝对至上，就意味着入了宗教的圈套”。

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许崇清在这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在《所谓“社会底教育作用”其实是人类底社会的实践活动底自己发展自己学习》（一九四一年）这篇文章里，他对杜威的“社会底教育作用”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这是以社会的群众团体的作用去代替整个社会的规律性，未能把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既改造自然也改造人类自身的本性看作社会的教育作用。他的明确结论是：“社会底教育作用，其实是人类底社会的实践活动底自己发展自己学习。”这个观点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在《杜威社会改造思想批判》（一九四二年）中，他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系统地分析了杜威的社会学说，指出杜威的根本错误是把个人理解为脱离社会关系总和的抽象的个人。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许崇清在艰难的条件下从事教育工作。当时，他撤退到受日本侵略军四面包围的广东西北部的连县三江墟。在那里，有一个中山大学分教处，他在自己的临时住所里，用床板当桌子，坚持向学生讲课，一直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月，他回到了久别的广州。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他主要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当时，他任教于中山大学和江苏社会教育学院，来往于广州和苏州之间，并撰写了几篇学术水平很高的论著。在《自由底涵义与文化底自由》（一九四六年）中，他深入分析了“自由”观念的发展，从古代希腊的个人的非政治的消极的自由观念，演变到近世在文艺复

兴后的个性的独创的生产活动的自由的积极观念。法国大革命以后，自由的内容包含了民主主义即政治的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又提出了个性自由、市民自由、人格自由、意志自由、文化自由等。他着重指出，独立于政治以外的文化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真正实行彻底的政治民主，才能获得文化上的自由。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现代各派教育哲学或哲学的教育学》（一九四六年）一文，是他为了消除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流派在我国的影响而写的。文中指出，施普兰格尔的文化教育学是文化哲学的具体化的东西，文化哲学是以“精神生活”为出发点，并以价值追求的精神为其本源，从而产生出社会制度、文化科学、宗教等等，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又指出，李凯尔特以文化科学为认识的工具，但认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差别在于两者的方法上，自然科学是总括的，文化科学是个别的，这是形而上学的。又指出，利特把生命哲学、现象学和黑格尔主义结合起来，主张教育学应以文化哲学为背景才能成立，教育上的理论是生命冲动的表现，这始终是主观唯心论的东西。对于那托尔卜，他指出，这个学者根据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与社会学的原理，以“意志陶冶”为教育学的根本概念，认为意是知与情的基础，又认为个人意识具有先天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具有自我构成的作用和与人同化的作用，超时间的理论的根据是意识的统一，这纯属虚构。并指出，那托尔卜以道德的理想为支配着社会历史的永远的定律，以为历史是受自由支配的，这是唯心主义。许崇清指出，克里克以为教育本源的生起，即教育的本质在于社会的同化，教育是人类存在的精神的根本机能，是人与人所由而互相形成和结合的交互作用，还把社会形式与具体社会内容相分离进行研究，被称为“现象学的教育学”，这种观点带有新康德主义形式社会学的色彩，后又沾染上新黑格尔主义的文化社会学的气质，即从社会的历史的规定性去认识各种文化形态。他认为，克里克主张教育要适应国家政治现实而加以改革，这完全适应了法西斯政治的需要。许崇清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现代世界各个教育哲学思想流派的分析，是很有启发性